

同伴地位对校园欺凌中旁观者防护行为的影响 ——社会自我效能感及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傅纳, 丁翔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探索同伴地位、社会自我效能感以及道德推脱对旁观者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方法:采用中文版青少年欺负参与问卷、同伴提名问卷、社会自我效能感问卷和道德推脱问卷对1279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相较于普通型同伴地位,受拒斥型同伴地位能够显著直接负向预测旁观者防护行为;②以普通型同伴地位为参照,社会自我效能感在受欢迎型、受拒斥型、有争议型以及被忽视型同伴地位对旁观者防护行为的预测中发挥中介效用;③以普通型同伴地位为参照,道德推脱在受欢迎型和受拒斥型同伴地位对防护行为的预测中发挥中介效用;④以普通型同伴地位为参照,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在受拒斥型同伴地位与防护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同伴地位不仅直接影响旁观者的防护行为,还会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间接影响旁观者防护行为。

【关键词】 同伴地位; 社会自我效能感; 道德推脱; 校园欺凌; 旁观者防护行为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4.05.009

The Effect of Peer Status on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in School Bully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FU Na, DING Xiang-yu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eer status,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on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Methods: 127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ullying participation questionnaire, peer nomination questionnaire, social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Rejected peer statu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defending behavior compared to average peer status; ②Social self-efficacy mediated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popular, rejected, controversial, and neglected peer status on bystander defending behavior using average peer status as a reference; ③Moral disengagement mediated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popular and rejected peer status on defending behavior using average peer status as a reference; ④Social self-efficac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jected peer status and defending behavior, using average peer status as a reference. Conclusion: Peer statu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through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Key words】 Peer status; Social self-efficacy; Moral disengagement; School bullying;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是指一个或多个学生长期反复有意识地对另一个学生施加身体或心理暴力,造成身体或精神痛苦的一种攻击行为^[1]。校园欺凌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对校园欺凌进行预防和干预变得至关重要^[2]。在校园欺凌的防治过程中,有一支重要的力量不容忽视,即庞大的旁观者群体^[3]。所谓旁观者,是指校园欺凌事件中既不属于欺凌者也不属于受害者的人群^[4],他们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欺凌事件的发展进程^[5]。如果旁观者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在57%的情况下是能够有效制止欺凌行为的^[6]。Salmivalli^[7]等人曾对旁观者角色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将其划分为四类,分别是强化者

(reinforcer of the bully)、局外者(outsider)、辅助者(assistant of the bully)以及防护者(defender of the victim)。其中,根据是否采取防护行为将强化者、辅助者和局外者统称为“消极旁观者”(passive bystanders),将防护者称为“主动防护者”(active defenders)^[8]。所谓防护行为是指,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并采取干预措施以阻止欺凌事件的发生或继续,不仅包括喝止、肢体阻挡等直接方式,也包括求助强者、语言劝阻等间接方式,还涉及到对受害者进行安慰和支持^[9]。

然而,在校园欺凌发生时,只有少数(<20%)学生能够真正站出来为受害者说话^[10],多数旁观者倾向于表现出维持而不是对抗欺凌的行为方式^[11]。是什么因素影响旁观者实施防护行为呢?

人一情境整体交互作用论^[12]指出,个体的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同伴是环境的重要

通信作者: 傅纳, funabnu@163.com

组成部分,个体在进入青春期后,会越来越强调自己与同龄人的关系^[13]。社会生态系统发展观也认为,同伴群体作为个体成长的微观社会环境^[14],其关系质量以及同伴地位的高低往往能够对个体的行为发展起到预测作用^[8]。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还缺少从与学生互动的结构或场所(如同伴群体、学校班级)的视角去探讨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行为表现的影响因素和潜在机制的研究^[15,16]。鉴于此,本研究拟考察同伴地位与旁观者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

同伴地位(peer status)是判断群体对个体态度的关键指标,通常被划分为普通型、受欢迎型、受拒斥型、被忽视型以及有争议型等五种类型^[17]。研究表明,旁观者在观察欺凌行为时,会重视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18]。具有较高同伴地位、更受欢迎的旁观者倾向于在欺凌事件发生时采取防护行为^[19],例如,制止欺凌继续和安慰受害者。同伴地位会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可能原因是,受欢迎的个体通常会有更多的朋友或者追随者,因此,做出防护行为所带来的人际损失风险较低。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受欢迎的个体本身具有良好的社会技能,在面对冲突事件时能够有信心和实力以积极的方式进行处理。还有一种可能是受欢迎的个体往往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道德水平,在其内在信念的影响下会激活个体的行为启动机制^[20]。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关于人际关系对社交冲突中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的作用仍不完全清楚^[21],道德因素对青少年旁观者行为的贡献也未被充分探讨,尤其是在青少年不确定是否有能力和信心保护受欺负同伴的背景下^[22]。

根据自我效能感理论,人们对自己能够应对问题的认知一部分是来源于现实中的人际互动经验,积极的同伴关系已经被证明可以提高青少年在干预欺凌事件中的自我效能感^[23,24]。而青少年旁观者行为的情境-认知模型(situational-cognitive model of adolescent bystander behavior)^[25]认为,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个体实际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欺凌情境下对受害者进行积极干预是一种具有风险的行为,防护者必须面对强大的欺凌者。而一些旁观者之所以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也是因为害怕自己因实施防护行为而受到牵连进而成为下一个受害者^[26,27]。缺少效能感,受制于自保而非助人的信念时,目击欺凌过程的儿童、青少年会较少主动介入,而更多地是采取消极旁观的方式^[28]。研究显示,学生在保护欺凌受害者时的自我效能感与他们实际的保护行为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29,30]。

当个体目睹欺凌时,决定如何行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31]。道德推脱是指当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时,通过一定方式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以使自身行为看起来伤害性最小的一种认知倾向^[32]。个体的同伴关系与其道德成长发展密切关联。Bandura等人指出,青少年在与他人的持续互动过程中,道德推脱逐渐形成并完善^[33]。消极的环境因素会导致道德认知偏差,进而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16]。早期社会联结理论(social bonding theory)^[34]也认为,个体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关系(社会联结)有利于其发展出社会规范和道德感,而社会联结破裂的个体则往往会不受道德规范约束,对事件做出更多道德推脱性的解释,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如果旁观者在同龄人中的地位不够高,可能不会选择做出防护行为^[35],而道德推脱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能够使得人们在不道德行为发生或未能进行道德行为时避免负面情绪,即能够让旁观者在选择不作出干预行为时减少痛苦^[36]。道德推脱理论也详细阐述了自我调节的道德过程在攻击性等消极行为产生中的作用^[37,38]。已有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地认为,道德推脱与旁观者的防护行为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39,40],即道德推脱水平越高,个体在欺凌情境中拒绝或逃避做出防护行为的倾向性就越大^[39,41]。

根据道德能动性的社会认知理论,道德行为取决于个人对自己能否按照道德标准行事的能力信念^[38]。其中自我效能感就是个体对自身影响环境能力的一种信念,也是个体行为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42]。另外,工作场所中欺凌旁观者的意义建构模型详细地阐释了旁观者道德推脱的形成机制,其中旁观者可能会通过重建个人能动性来削弱自身的责任感,即他们会将自己评估成没有足够能力去解决问题或其他人能够更好地应对,以此作为自己不采取行动的理由^[43]。研究表明,青少年解决网络欺凌情境的自我效能感与他们对网络欺凌行为的个人道德信念呈正相关^[44],旁观者建设性防御行为的自我效能感与道德推脱水平呈负相关^[45]。旁观者感知到的约束会导致其对结果的低期望和对个人执行能力的的不信任,从而抑制其道德行为的发生^[46]。

综上,本研究依据人-情境整体交互作用和社会认知等理论,考察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是否在同伴地位与中学生旁观者防护行为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以上分析,主要提出以下假设:同

伴地位、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均能直接预测旁观者的防护行为;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能够在同伴地位和旁观者防护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能够在同伴地位和旁观者防护行为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方便取样的方法,对北京市和安徽省的两所初中、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两所高中的学生进行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1485 份,回收问卷 1338 份,问卷的回收率为 90.10%。经过严格筛查,剔除无效问卷,最终有效问卷共 1279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86.13%。被试的年龄为 15.03 ± 2.01 岁,其他基本情况详见表 1。

表 1 样本分布构成情况表($n=1279$)

项目		<i>n</i>	%
地区	北京	234	18.30%
	广西	324	25.33%
	安徽	324	25.33%
	广东	397	31.04%
性别	男生	499	39.01%
	女生	780	60.99%
年级	初一	264	20.64%
	初二	175	13.68%
	初三	119	9.30%
	高一	254	19.86%
	高二	233	18.22%
	高三	234	18.30%
	旁观者角色	欺凌者	123
受害者		94	7.35%
辅助者		58	4.53%
强化者		213	16.65%
局外者		311	24.32%
防护者		346	27.05%
	无角色者	134	10.48%

1.2 研究工具

1.2.1 青少年欺负参与问卷(Participant Role Questionnaire, PRQ) 采用由 Salmivalli 等人^[7]编制,张文娟^[47]修订的中文版青少年欺负参与问卷(PRQ)。该问卷由欺凌者、受害者、辅助者、强化者、局外者和防护者 6 个分量表组成,共有 24 个题项,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 ~ 0.98,分半信度为 0.80 ~ 0.97。施测时要求被试根据实际情况对自己以及班内同性别同学在欺凌情境中的行为表现进行 Likert-3 点评定,从 0-“从来没有表现出这种行为”到 2-“经常表现出这

种行为”。计分规则如下:以防护者为例,经过标准化后,若参与者在防护者分量表上的得分超过该分量表的均分,且比其它分量表得分高,那么该被试的参与角色就是防护者;但如果参与者在每个分量表上的得分都低于平均分,或者被试两个最高得分之间的差异小于 0.01,那么该参与者即为无角色者。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旁观者的防护行为,因此,在对角色进行划分之后剔除欺凌者、受害者和无角色者三类被试群体,最后采用旁观者角色群体中的防护者分量表得分来表示旁观者的防护行为。

1.2.2 同伴提名问卷 采用同伴提名法(peer nomination)来测量被试的同伴地位。首先,给被试发放其所在班级同学的名单,每位同学都对应一个编号。然后,请其分别列出“过生日时最想邀请的班级当中的 3 位同学的编号”(正向提名,以 P 来表示)和“分组活动中最不希望同组的三位同学编号”(负向提名,以 N 来表示)。计算班级每名同学被提名的次数,再以班级为单位将分值转化成标准分(Z 分数),分别得出 ZP 和 ZN 的值,以此作为衡量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的指标。

按照 Coie 和 Dodge^[17]所提出的方法,将同伴提名的结果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社会喜好(social preference, SP)和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 SI)。其中,社会喜好=积极提名分(ZP)-消极提名分(ZN),反映一个学生被同伴喜欢的程度;社会影响=积极提名分(ZP)+消极提名分(ZN),反映一个学生在同伴中所具有的影响力。每一名被试的同伴地位可以按以下标准予以划分:①受欢迎型:SP>1.0, ZP>0, ZN<0;②受拒斥型:SP<-1.0, ZP<0, ZN>0;③有争议型:SI>1.0, ZP>0, ZN>0;④被忽视型:SI<-1.0, ZP<0, ZN<0;⑤普通型:除了上述四种类型以外的其他学生。

1.2.3 社会自我效能感问卷(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elf-Efficacy, PSSE) 采用由 Smith 和 Betz^[48]编制、孟慧等人^[49]修订的中文版社会自我效能感问卷。该问卷共有 18 个题目,采用 Likert-5 点计分,从 1-“完全没信心”到 5-“完全有信心”,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会自我效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为 0.94。

1.2.4 道德推脱问卷(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本研究选取由 Bandura 等人^[50]编制、王兴超和杨继平^[51]修订的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该问卷共有 32 个题目,分为 8 个维度,分别是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责备归因、非人性化,每个维度包含 4 个题项。问卷采用

Likert-5点计分,从1-“非常不赞同”到5-“非常赞同”。在本研究中,该问卷总的Cronbach α 是0.89。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的录入和整理。由于在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两个连续变量的题项当中,缺失值最大占比不超过2.00%,因此采用序列均值插补的方式进行缺失值替换,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应用Amos 23.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共10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并且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9.37%,小于40%的临界标准^[52],所以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于普通型的被试群体在各个变量上的水平较为稳定,无显著行为特征^[53],在划分维度上均表现出“一般性”^[54],因此其常被当作参照来分析其他各种同伴地位类型对旁观者防护行为的影响。此外,同

伴地位是不能直接测度的非数值型变量,其只能用于说明某种属性或状态是否存在。因此,本研究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以实现运算处理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同伴地位可生成4个虚拟变量,以“0”(指不存在某种属性或状态)和“1”(指存在某种属性或状态)的不同呈现方式来代表受欢迎 vs 普通型、受拒斥 vs 普通型、有争议 vs 普通型、被忽视 vs 普通型。

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普通型同伴地位,受欢迎型与社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而其他三种同伴地位类型与社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相较于普通型同伴地位,受欢迎型与道德推脱呈显著负相关,而受拒斥型和被忽视型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有争议型与道德推脱的相关不显著;相较于普通型同伴地位,受欢迎型与防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而受拒斥型和被忽视型与防护行为呈显著负相关,有争议型与防护行为的相关不显著。社会自我效能感与道德推脱呈显著负相关,与防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与防护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具体结果详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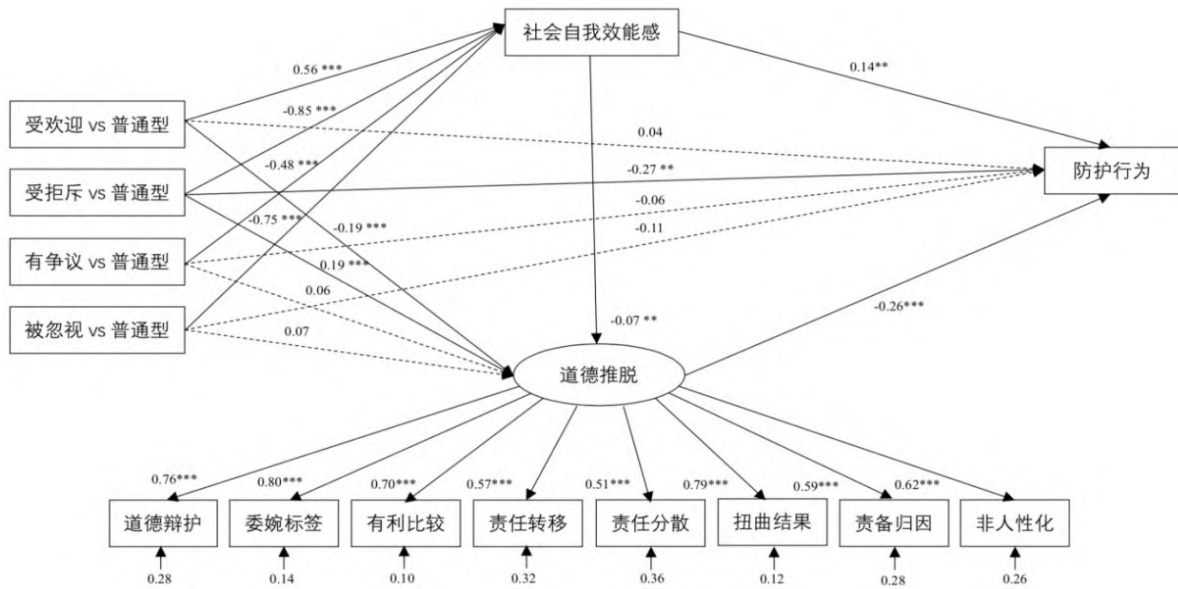
表2 同伴地位、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和防护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n=928$)

	1	2	3	4	5	6	7
1.受欢迎 vs 普通型	—						
2.受拒斥 vs 普通型	-0.21***	—					
3.有争议 vs 普通型	-0.16***	-0.15***	—				
4.被忽视 vs 普通型	-0.31***	-0.30***	-0.22***	—			
5.社会自我效能感	0.56***	-0.33***	-0.07*	-0.38***	—		
6.道德推脱	-0.24***	0.21***	-0.01	0.08*	-0.26***	—	
7.防护行为	0.17***	-0.18***	-0.01	-0.09**	0.23***	-0.34***	—
$M\pm SD$	0.18±0.38	0.17±0.37	0.10±0.30	0.31±0.46	3.38±0.73	1.82±0.50	0.17±0.74

注: * $P<0.05$, ** $P<0.01$, *** $P<0.001$ 。

表3 同伴地位预测旁观者防护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同伴地位	路径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受欢迎 vs 普通型	受欢迎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防护行为	0.078	0.098	0.325
	受欢迎 vs 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0.049	0.006	0.021
	受欢迎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0.010	-0.014	0.003
受拒斥 vs 普通型	受拒斥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防护行为	-0.119	-0.178	-0.050
	受拒斥 vs 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0.049	-0.043	-0.006
	受拒斥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0.015	-0.010	-0.003
有争议 vs 普通型	有争议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防护行为	-0.067	-0.067	-0.008
	有争议 vs 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0.016	-0.012	0.016
	有争议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0.009	-0.003	0.001
被忽视 vs 普通型	被忽视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防护行为	-0.105	-0.167	-0.051
	被忽视 vs 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0.018	-0.010	0.009
	被忽视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0.014	-0.008	0.001



注:路径系数表示标准化系数。 ** $P < 0.01$, *** $P < 0.001$ 。

图1 同伴地位、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和防护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

2.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按照自变量为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55],本研究将同伴地位5个类别编码为四个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将社会自我效能感与道德推脱作为中介变量,防护行为作为因变量,利用AMOS 23.0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取5000次样本计算95%置信区间,结果见表3。模型主要拟合指数如下: $\chi^2 = 158.801$, $\chi^2/df = 2.741$, RMSEA=0.042, GFI=0.977, AGFI=0.958, CFI=0.977, NFI=0.964, IFI=0.977。根据侯杰泰等人^[56]对于拟合指数的标准,本研究链式中介模型拟合良好。有两条简单中介路径的95%置信区间包括0,分别是有争议 vs 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和被忽视 vs 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有三条链式中介路径的95%置信区间包括0,分别是受欢迎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有争议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被忽视 vs 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模型中各路径系数见图1。

3 讨 论

本研究将影响欺凌事件中旁观者行为的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相结合,探讨了同伴地位与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受拒斥型同伴地位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旁观者防护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冲突解决情境中,受拒斥的儿童相较于普通型儿童更可能选择逃避^[57],这是因为他们

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来对抗欺凌者^[58]。根据人一情境整体交互作用论^[12]和青少年旁观者行为的情境-认知模型^[25],个体对自身认知的形成与发展是依据一定现实基础的,所以对行为发生的考察也必须将具体的外在条件包含在内。而且,个体在采取行动时会首先对自身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进行评估,若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挽回局面或者进行对抗,便会放弃行动计划。另外,对于同伴地位较低的个体,由于长时间在群体内受到排斥,很可能会迫于欺凌者强势的力量和嚣张的气焰而加入到亲欺凌者一方,而成为辅助者或者强化者。研究发现,社会地位不安全感能够正向预测18个月后的关系攻击行为^[59]。

受欢迎型同伴地位并不能显著正向预测旁观者防护行为,虽然受欢迎的学生往往在群体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47],成为后续受害者的概率较低^[60],但旁观者做出防护行为确实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61]。青少年旁观者行为的情境-认知模型认为^[25],个体在采取实际行动之前会经历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因此,自身以及情境等其他因素可能会削减同伴地位的直接影响。有争议型和被忽视型同伴地位都不能显著负向预测旁观者防护行为。虽然有争议的个体在同伴群体中获得较多的负向提名,日常交往中也可能受到一定的排挤,内心会积攒一定的消极情绪^[62],但是也可能受到一部分学生的喜欢,相较于受拒斥的群体而言其自尊水平更高^[63]。因此,在面对行为决策时表现出不确定性^[64],他们可能同时使用亲社会和攻击性策略来获得同伴群体中的权力和资

源^[64]。而被忽视型与普通型相比,通常更加害羞、孤僻,不善于交际,参与的同伴互动更少^[65]。因此,他们常常会感到自己在同伴群体中没有特别强烈的存在感,处在一种较为游离的状态之中。长此以往,容易使得这一部分学生更多关注于自身,出现诸如消极自我评价、内心恐惧等内隐性行为问题^[64]。并且他们很少会表现出主动、友好的行为,同时也很少表现出不友好、攻击性的行为^[66]。所以当欺凌事件发生时,他们更有可能认为与自己无关,并且出于保护自己的想法而保持中立。

社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旁观者的防护行为,并且还能够对同伴地位对防护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与普通型同伴地位相比,受欢迎同伴地位对社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受拒斥、有争议和被忽视这三种同伴地位类型则对社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根据自我效能感理论^[66]和社会支持附加与直接模型^[67],个体在构建积极同伴关系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社交技能,使其能够具有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关系中的支持也会增进其应对效能,提高积极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激活受欢迎同伴地位群体的助人动机,促使其采取防护行为。受欢迎的个体在面对欺凌事件时,认为自己凭借在群体内的地位有能力对局面进行掌控,但地位较低的个体会避开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而更倾向于处理自认为力所能及的事情^[66]。研究表明,在群体中受人欢迎会增加个体的自我效能感^[68],而高社会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干预行为^[29]。在班级中具有较高同伴地位的学生可以通过他们较高的自我效能感采取保护受害者的行为^[69]。相反,社会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在随后的社会交往中则会更多地采取回避、退缩等态度或行为^[26]。

道德推脱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防护行为,并能在受欢迎型和受拒斥型同伴地位与防护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情境因素是道德推脱形成的关键前因^[70]。社会联结理论也指出,个体与重要他人的社会联结有利于其发展出道德感^[34]。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在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一整套道德标准,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71]。那些更受同龄人偏爱的学生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因此,他们可能会由于感受到强烈的道德义务而帮助受害者^[23]。而那些不被同龄人喜欢的个体,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对道德缺乏正确的认知和评价^[72],容易通过启动道德

推脱来为自己进行辩解,甚至采取责任转移和分散、扭曲结果的方式来避免自身被牵扯其中^[73]。

社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道德推脱,并且在受拒斥型同伴地位和防护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根据道德能动性的社会认知理论,道德行为与个人的能力信念密切相关^[38]。效能感的缺乏常常是限制个体行为以及导致道德推脱的重要前置变量^[74]。校园欺凌实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40],其中涉及到不同欺凌参与者角色之间的互动。在这种情境中,个体所做出的行为反应更可能受到社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如果个体没有对自己成功干预能力的坚定信念,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抑制。而道德推脱正是个体在道德困境中无法使行为匹配或达到社会规范而引发的认知机制。当个体被卷入到校园欺凌中时,会对自己是否采取行动以达到期望目标进行提前预估。高社会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在冲突中有效化解矛盾,获得同伴支持,维持群体秩序,进而更有可能采取较为积极的行为、态度对待欺凌事件,所以与旁观者防护行为呈正向相关,而社会自我效能感低下的旁观者则反之。当个体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友谊网络,不具备为弱势群体挺身而出的信念,高水平的道德推脱会抑制道德自我约束的激活,使青少年从自责中解脱出来,从而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旁观行为^[75]。这一结果也支持工作场所欺凌旁观者的意义建构模型^[43],当旁观者试图进行道德推脱时,可能会将自己的能力评估成无法成功干预欺凌,以此减少自身的内疚感。

参 考 文 献

- 1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Basic facts and effects of a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 Allied Disciplines*, 1994, 35(7): 1171-1190
- 2 Anderson JR, Mayes TL, Fuller A, et al. Experiencing bullying's impact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ediating role of adolescent resilienc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2, 310: 477-483
- 3 Salmivalli C, Voeten M. Connections between attitudes, group norms, and behaviour in bullying situ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4, 28(3): 246-258
- 4 王中杰,刘华山.校园欺负中的欺负/受欺负者和旁观者群体研究综述.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4, 20(1): 92-96
- 5 Fissel ER, Bryson SL. To intervene or not intervene: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self-control, and empathy in bullying bystander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rime and*

- Justice, 2023, 46: 1-18
- 6 Hawkins LD, Pepler DJ, Craig WM. Naturalistic observations of peer interventions in bullying. *Social Development*, 2001, 10(4): 512-527
 - 7 Salmivalli C, Lagerspetz K, Björkqvist K, et al. Bullying as a group process: Participant rol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social status within the group. *Aggressive Behavior*, 1996, 22(1): 1-15
 - 8 Pozzoli T, Gini G. Longitudinal relations between students' social status and their roles in bully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perceived social statu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2021, 20(1): 76-88
 - 9 Huitsing G, Veenstra R. Bullying in classrooms: Participant roles from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 2012, 38(6): 494-509
 - 10 Pronk J, Goossens FA, Olthof T, et al. Children'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situations of victimization by bullying: Social cognitions of outsiders versus defender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013, 51(6): 669-682.
 - 11 Salmivalli C, Voeten M, Poskipta E. Bystanders matter: Associations between reinforcing, defending, and the frequency of bullying behavior in classroom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2011, 40(5): 668-676
 - 12 Magnusson D, Stattin H. Person context interaction theory. In Damon W, Lerner RM(Vol.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1.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 Wiley, 1998. 685-759
 - 13 Tiina O, Danielle NF. Social goals, aggression, peer preference, and popularity: Longitudinal links during middle schoo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4, 50(8): 2134-2143
 - 14 Bronfenbrenner U. Contexts of child rea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 34(10): 844
 - 15 Zhang Y, Lan X, Cui G, et al. The silver lining in the dark cloud of social status insecur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pularity goal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tatus insecurity and Chinese adolescents' bullying bystander behavio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21, 37(17- 18): NP15851-NP15873
 - 16 Wu Y, Zhou Y, Shi L. Defender self-efficac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on social support and bystander behavior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 multi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Psicologia: Reflexão e Crítica*, 2023, 36(1): 1-14
 - 17 Coie JD, Dodge KA, Coppotelli H. Dimensions and types of social status: A cross-age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2, 18(4): 557-570
 - 18 Forsberg C, Thornberg R, Samuelsson M. Bystanders to bullying: Fourth- to seventh-grade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their reactions. *Research Papers in Education*, 2014, 29(5): 557-576
 - 19 Rambaran JA, Pozzoli T, Gini G. Socio-cognitive processes and peer-network influences in defending and bystanding.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22, 51(11): 2077-2091
 - 20 任萍, 张云运, 周艳云. 校园欺负中的积极参与角色: 保护者.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1): 98-106
 - 21 Wachs S, Görzig A, Wright MF, et al. Associations among 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peers, and teachers, self-efficacy, and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in bullying: A social cognitive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17(2): 420
 - 22 Patrick RB, Rote WM, Gibbs JC, et al. Defend, stand by, or join in?: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moral identity, moral judgment, and social self-efficacy on adolescents' bystander behaviors in bullying situation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9, 48(10): 2051-2064
 - 23 Pronk J, Olthof T, Aleva EA, et al.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adolescents' bullying-related indirect defending, outsider behavior, and peer-group statu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20, 30(S1): 87-99
 - 24 Thornberg R, Wänström L, Hong JS, et al. Classroom relationship qualities and social-cognitive correlates of defending and passive bystanding in school bullying in Sweden: A multi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017, 63: 49-62
 - 25 Casey EA, Lindhorst T, Storer HL. The situational-cognitive model of adolescent bystander behavior: modeling bystander decision-making in the context of bullying and teen dating violenc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2017, 7(1): 33-44
 - 26 Bauman S, Yoon J, Iurino C, et al. Experiences of adolescent witnesses to peer victimization: The bystander effect.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020, 80: 1-14
 - 27 Hazler RJ. *Break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terventions for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Taylor & Francis, 1996.
 - 28 李欣, 刘爱书, 韩毅初. 缘何内省不疚? 儿童青少年道德推脱与欺凌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3, 31(3): 723-728
 - 29 Gini G, Pozzoli T, Borghi F, et al. The role of bystanders in students' perception of bullying and sense of safety.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008, 46(6): 617-638
 - 30 Pöyhönen V, Juvonen J, Salmivalli C. What does it take to stand up for the victim of bully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personal and social factor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010, 56(2): 143-163
 - 31 Troop-Gordon W, Frosch CA, Totura WMC, et al. Pred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bullying bystander behavior: A short-term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019, 77: 77-89
 - 32 Bandura A.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scope of self-

- efficacy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86, 4: 359-373
- 33 梁晓燕, 刘晓飞. 父母心理控制与中职生网上偏差行为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特殊教育*, 2017(3): 71-77
- 34 Hirschi T. *Causes of delinquenc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 35 Garandeau CF, Vermande MM, Reijntjes AHA, et al. Classroom bullying norms and peer status: Effects on victim-oriented and bully-oriented defen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19, 46(5): 401-410
- 36 Gini G, Thornberg R, Pozzoli T. Individual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bystander behavior in bullying: The role of moral distress and col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Psychology of Violence*, 2020, 10(1): 38
- 37 Pituch KA, Whittaker TA, Stapleton LM.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to test for mediation in multisite experiment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05, 40(1): 1-23
- 38 Bandura A. *Moral disengagement: How people do harm and live with themselves*. Worth, 2016.
- 39 王小凤, 燕良轼, 丁道群, 等. 学校道德氛围感知对中学生冷漠旁观行为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3, 31(2): 396-401
- 40 Thornberg R, Jungert T. Bystander behavior in bullying situations: Basic moral sensitivity,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defender self-efficacy.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3, 36(3): 475-483
- 41 Caravita SCS, Sijtsema JJ, Rambaran JA, et al. Peer influences on moral disengagement in lat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4, 43(2): 193-207
- 42 Allison KR, Bussey K.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moral influences on intervention in cyberbully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 74: 7-15
- 43 Ng K, Niven K, Hoel H. "I could help, but...": A dynamic sensemaking model of workplace bullying bystanders. *Human Relations*, 2020, 73(12): 1718-1746
- 44 Veiga Simão AMV, Ferreira P, Francisco MS, et al. Cyberbullying: Shaping the use of verbal aggression through normative moral beliefs and self-efficacy.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2): 4787-4806
- 45 Luo A, Bussey K. The selectivity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defenders of cyberbullying: Contextual moral dis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9, 93: 318-325
- 46 Thornberg R, Wänström L, Elmélid R, et al. Standing up for the victim or supporting the bully? Bystander response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moral disengagement, defender self-efficacy,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020, 23(3): 563-581
- 47 张文娟. 初中生在欺负情境中的参与者角色与同伴地位. 山东师范大学, 2005
- 48 Smith HM, Betz N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elf-efficacy.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000, 8(3): 283-301
- 49 孟慧, 范津砚, 柳菁. 目标定向与适应: 社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1): 54-58
- 50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V, et al.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1(2): 364-374
- 51 王兴超, 杨继平. 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2): 177-179
- 52 Podsakoff PM, MacKenzie SB, Lee JY, et al.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5): 879-903
- 53 王文, 盖笑松. 不同社会行为倾向小学生的同伴地位特点.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4, 12(6): 790-794
- 54 陈欣银, 李正云, 李伯黍. 同伴关系与社会行为: 社会测量学分类方法在中国儿童中的适用性研究. *心理科学*, 1994(4): 198-204
- 55 方杰, 温忠麟, 张敏强. 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科学*, 2017, 40(2): 471-477
- 56 侯杰泰.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 57 Asher SR, Renshaw PD, Hymel S. Peer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kills. *The Young Child: Reviews of Research*, 1982, 3: 137-158
- 58 Beatriz L, Alicia P, Eduardo F, et al. Bullying, defending, and outsider behavio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status and gender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empath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8, 59(4): 473-482
- 59 Long Y, Li Y. Th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tatus insecurity and relational aggression: Moderation effects of social cognition about relational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2020, 46(1): 84-96
- 60 Salmivalli C, Kärnä A, Poskiparta E. From peer putdowns to peer support: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how it translated into a national anti-bullying program. *Handbook of Bullying in Schools*. Routledge, 2009. 441-453
- 61 Caravita SCS, Blasio DP, Salmivalli C. Unique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empathy and social status on involvement in bullying. *Social Development*, 2009, 18(1): 140-163
- 62 林磊. 不同同伴地位小学生对同伴冲突行为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 63 陈斌斌, 李丹. 班级生态系统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8, 16(5): 733-739
- 64 Braza F, Braza P, Carreras MR, et al. Behavioral profil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status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

- observational approach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7, 35(2): 195-212
- 65 Wilt F, Veen C, Kruistum C, et al. Why do children become rejected by their peers? A review of studi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sociometric status in childhoo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19, 31(3): 699-724
- 66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Advances in Behaviour Research & Therapy*, 1977, 1(4): 139-161
- 67 Cohen, Sheldon. Issues in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1985, 3: 3-22
- 68 Ladd GW. Probing the adaptive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s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school context: A child by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2003, 31: 43-104
- 69 Saarento S, Salmivalli C. The role of classroom peer ecology and bystanders' responses in bullying.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2015, 9(4): 201-205
- 70 Bandura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elf-regul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248-287
- 71 张孟. 父母控制与初中生网络欺负: 道德推脱和自我控制的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 72 Fontaine RG, Fida R, Paciello M, et al.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from peer rejection in adolescence to crime in early adulthood. *Psychology, Crime & Law*, 2014, 20(1): 1-19
- 73 Staub E. Genocide and mass killing: Origins, prevention, healing and reconcili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0, 21(2): 367-382
- 74 Mccarthy J, Deady R. Moral distress reconsidered. *Nursing Ethics*, 2008, 15(2): 254-262
- 75 Jiang S, Liu RD, Ding Y, et al. Why the victims of bullying are more likely to avoid involvement when witnessing bullying situations: The role of bullying sensitivit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22, 37(5-6): NP3062-NP3083
- (收稿日期:2024-02-24)
-
- (上接第981页)
- 40 Di Carlo F, Pettoruso M, Alessi MC, et al. Characterizing the building blocks of problematic use of the internet (PUI): The role of obsessional impulses and impulsivity traits among Italian young adults.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2021, 106: 152225
- 41 杨琴, 胡蓉, 曾子豪, 等. 儿童期受虐、生活事件和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关系: 一个多重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 29(5): 1023-1027, 1031
- 42 黄曙杰, 郭菲, 王雅芯, 等. 生活事件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1): 70-74
- 43 Torres-Rodríguez A, Griffiths MD, Carbonell X, et al.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n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linical sample.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2018, 7(3): 707-718
- 44 Guo YY, Gu JJ, Gaskin J, et al. The association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The serial mediating effects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depress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2023, 140: 106134
- 45 Imthou AK, Caldart CA, do Rosário MC, et al.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clinical expression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2020, 9(10): 3371
- 46 尧丽, 杨海帆, 吴美霖, 等. 正强化和负强化: 概念、争议与神经机制. *心理科学*, 2017, 40(5): 1091-1097
- 47 Moretta T, Buodo 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in internet use disorder.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700518
- 48 Aldao A, Nolen-Hoeksema S. When are adaptive strategies most predictive of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12, 121(1): 276-281
- (收稿日期:2023-07-22)